

为了永远的怀念：纪念周恩来诞辰 120 周年

一、风华正茂 苦求真理

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参加“五·四”运动

周恩来出生的当年，中国所处的环境

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朝晚期，甲午战争失败后，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

1898 年 2 月 9 日，清政府开始筹借第三期对日赔款。清总理衙门与英国汇丰银行、德国德华银行在北京签订了《英德续借款合同》十七款，另附《付还本利日期数》一件。借款偿还期内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必须由英国人充任。2 月 14 日，清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与德使海靖在北京签订了《胶澳租界条约》。通过这一条约，德国不仅得以租借胶州湾，而且把山东全省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。3 月 11 日，法帝国主义向清政府提出“租借”广州湾(今广东湛江)的无理要求，并于当年闰三月初二(1898 年 4 月 22 日)派出军舰在广东雷州府遂溪县的海头汛(今湛江市霞山区沿海)武装登陆，强占海头炮台。对此，清政府却委曲求全，屈膝投降，竟然派官员与法军划定租界。法帝国主义入侵后，所到之处四出烧杀掳掠，妄图扩大“租借”范围。3 月，法国强迫清政府允其强租广州湾(今广东湛江)后，英国政府立即要求强租九龙半岛作为“补偿”。4 月 21 日，清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等与英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



签订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，将位于深圳河以南、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，即所谓“新界”，租借给英国，租期九十九年；租期内该地区完全归英国管辖。11 月 16 日，清政府却向法侵略者节节退让，钦差大臣苏元春与法国海军提督高礼睿签定了丧权辱国的《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》，把广州湾租借给法国，期限 99 年。

这一年，5 月 13 日，清总理衙门大臣奕

劻与英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《订租威海卫专条》，规定将威海卫及其附近海面(包括刘公岛、威海湾之群岛及沿岸十英里地方)租与英国，租期二十五年，期满后两国相商仍可延长。与英德订立瓜分津镇铁路协定，英国的铁路投资范围是长江以南各省和北经河南至山西；德国的铁路投资范围是山东省以及自黄河沿岸至南京一带。

这一年 8 月 25 日，中英签订《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》。

这一年，中国已经衰弱不堪，帝国主义列强还在“叫化身上剥破棉袄”。

童年时的周恩来

家庭的命运是国家命运的缩影，国家的命运决定着家庭的命运。

周恩来的童年相当艰苦。祖父去世后，父亲无力持家，家道中落，靠典当、借债和亲戚接济度日。债主连连催逼，生母和养母忧愤交加，一年中相继去世。刚刚十岁的周恩来就不得不分挑家务的重担。他要照顾两个弟弟，还要想方设法糊口。周家兴隆之时，驸马巷周宅宾客如云；如今家道衰落，连硬撑门面都办不到，只有债主上门。这使幼小的周恩来第一次体验到人间的世态炎凉。

1910 年，十二岁的周恩来离开了淮安，随伯父周贻唐去东北，先在铁岭银岗书院，后转入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就读。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是一个在外地谋生的小官吏。他的叔父周贻淦是四兄弟最小的一个，二十岁时得了癆病，膝下无嗣。为了“冲喜”，周家安排把刚满一岁的侄子过继给小叔，但是，小叔一病不起，终于夭折。周恩来便与年轻守寡的婶婶相依为命，为她添些慰藉。

周恩来从 4 岁开始跟随叔母识字和背诵唐诗，5 岁入私塾读书。叔母出身于书香门第，擅诗文书画，略懂医理。她常给大鸾讲神话故事和一些唱词，6 岁那年，周恩来一家搬到外祖父家居住，大家庭里难免有磕磕碰碰，虽说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但是周恩来的生母凭借自己的精明能干，总能公道地解决纠纷。周恩来常跟随生母去排除纠纷，耳闻目睹了母亲的办公公道，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周恩来在私塾一边念书，一边大量地读小说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肆意徜徉。“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《西游记》，后来又读了《镜花缘》、《水浒传》和《红楼梦》。”正当他有意识地孜孜不倦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养料时，两个母亲相继去世，父亲和伯父长年在外谋

生，一位叔父偏瘫，一位叔父早逝，身为长子长孙的周恩来不得不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居住，他用稚嫩的双肩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为了养活自己和年幼的弟弟，他强装笑脸靠典当借债主持家事，养成了少年老成的稳重性格。

1910 年春，12 岁的周恩来随伯父到东北求学，转入新建的奉天第六高等小学堂。这正是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时期，周恩来告别了私塾生活，进入新式小学堂，对一切都充满好奇。那些新鲜有趣的课程，诸如国文、算术、历史、地理、音乐、美术和体操，真正激活了少年渴望窥探世界的心。这一年，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。国内时局风云变幻，也处在破旧立新的关键时刻。周恩来在老师的影响下坚持读书看报，及时了解国家大事。“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。没有这一次的离家，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…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，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，开始读革命书籍，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。”

1911 年底，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。有一天，魏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，题目是“立命”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发出剧烈变动的时期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清朝政府，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。很多人，特别是年青人思想困惑，没有明确的理想追求，没有人生奋斗的目标。校长讲“立命”，就是给学生讲怎样立志。

魏校长讲到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，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：“请问为什么读书？”有的同学说：“为了帮助父母记账。”此时，周恩来站起来，大声地说：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！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，这是周恩来毕生的目标。

1913 年 8 月，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，1917 年 6 月中学毕业，并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同学讲话。周恩来在校期间表现优异，同学对他评价极高：“君性温和诚实，最富于感情，挚于友情，凡朋友及公益事，无不尽力”；“以善交游，到处逢人欢迎”；“毕业成绩仍属最佳”；“君家贫，处境最艰，学费时不济，而独能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，造成斯绩”(南开学校〈第十次毕业同学录〉)。

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

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

私立学校，由严修创办，张伯苓担任校长。周恩来的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，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。周恩来十分珍惜学习机会，他为自己制订了五个“不虚度”的要求：读书不虚度，学业不虚度，习师不虚度，交友不虚度，光阴不虚度。“南开教育，是正常而自由的”，周恩来喜欢文学、历史，对政治感兴趣，对数理也有兴趣。总之，“喜欢能说理的东西，不喜欢死记的东西”。他的作文曾被评为全校第一名，得到“用笔遒劲，布局绵密”的评语。

因为“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”的便利条件，周恩来参加发起组织“敬业乐群会”，取



“敬重学业，联络感情”之意。他主编《敬业会刊》、《校风》周刊，发表小说和时事评论性文章。周恩来活跃在校园内外，他参加新剧团，扮演女角登台演出，参加学校演讲会、江浙同学会并分别当选为副会长和会长。1915 年，周恩来参加了反袁运动，反对“二十一条”卖国条约。他组织同学演讲、募捐，在“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”的情况下，青年周恩来已经显示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。

南开中学毕业后，周恩来认为自己应该继续深造，他筹划考官费留学生。既是官费，求学费用可暂不考虑。然而伯父早已无力负担南开学费，又去哪里筹措远渡重洋的旅费呢？幸好爱交朋友的周恩来为人诚信可靠，一些友人愿意向他提供路费。“我去日本念书，是自修，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。”在临别时刻，他给同学赠言说：“愿相会于中华腾飞

传播马克思主义

的消息传来，他决定“返国图他兴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，改变了周恩来的人生道路。

五四运动，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背景下爆发的，其导火索是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。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凌辱行径和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，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先进分子，走上街头，进行斗争。他们开始“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，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”，纷纷发表演讲、撰写文章、创办刊物、成立社团，宣传马克思主义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路径。

在日本时，周恩来就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情况，阅读了当地学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，初步认识了唯物史观、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等原理。对此，他深有感慨：“二十年华识真理，于今晚尚尚非迟。”与国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相比，周恩来更早更多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。这为他在五四运动中展示才华、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。

五四运动震动了全国，也震动了天津。周恩来还未入学便投入到了这场热烈的学生爱国运动中。大家熟知他品学兼优、才能出众，邀请其主编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。周恩来表示，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，负此责任义不容辞。起草的《发刊旨趣》，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，宣扬“民主主义”精神和“革心”与“革新”的办报主旨。发表后，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。创刊号上周恩来以“革心！革新！”为题撰写的发刊词，鲜明地提出了改造社会、改造思想的号召，被同学誉为“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，可有用得多！”他在报上疾呼：“国民啊！国民啊！黑暗势力‘排山倒海’的来了。”“我们当知道，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。”响亮地喊出：“罢工！罢市！不纳税！罢课！”以《会报》为阵地，周恩来传播马克思主义，揭露时政黑暗，唤醒民众觉悟。他主编的报纸有四五千订户，读者包括学生、员工在内的社会各界。

在周恩来的倡导下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选出部分骨干分子，组成了比学联更加严密的团体——觉悟社，并不定期出版《觉悟》社刊，以“灌输世界新思潮”。觉悟社的诞生把天津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。周恩来规定觉悟社的任务是本着“觉悟”的精神，作引导社会的先锋。他号召青年学生到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去，进行广泛宣传，“让国人知道国事真相”，“用全国的实力”去反对军阀政府。觉悟社成立不久便引起

社会关注。当时的北京《晨报》称觉悟社为“天津的小明星”，认为“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、纯洁、奋斗、觉悟的青年”。“他们抱了时时觉悟，刻刻觉悟的决心”，有着改造社会的愿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。周恩来总结觉悟社一年来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，今后的救国道路必须是革命青年在“改造的赤旗下联合起来”，到民间去，依靠劳工群众，“切切实实做点事”。这就是“宣传事业之联合；社会实况之调查；平民教育之普及；农工组织之运动；妇女组织之促进”。这种依靠工农劳苦大众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主张，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萌芽。

爱国群众运动浪潮汹涌向前，觉悟社一直是反帝救亡的排头兵。1919 年 11 月，天津一千多人游行演讲，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，数万人两次举行国民大会，焚烧日货，高呼救亡。1920 年 1 月，周恩来带领各校五六千学生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，遭到反动当局逮捕，被羁押半年之久。他浩气凛然，无所畏惧，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，自己讲“思想是颤动于狱中”。他还说：“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，‘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’”。在被监察厅羁押期间，周恩来等组织读书团、演讲会。他分五次演讲马克思主义学说。据他当时编写的《检厅目录》记载，所讲内容有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、马克思传记、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、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、《资本论》和资产集中说。在被监禁的条件下，能如此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，不仅说明了周恩来当时深厚的理论功力，更体现出他的崇高信仰和乐观精神。这对他一起坐牢的同学来说，是革命的启蒙教育，是黑暗中的理想之光。

如果说，入狱前，周恩来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造、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学生；而出狱后，他就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。他主张把五四运动以来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，采取共同行动，改造旧的中国，挽救中国的危亡。他带领觉悟社成员来到北京，约请其他社团代表集会，就“改造联合”的主张作了说明。李大钊出席了此次活动，激励大家坚信主义，用主义齐心志、搞联合。最后，由这些团体共同发表改造联合“宣言”和“约章”，宣布要联合各地主张革新的团体，分工合作，实行社会改造，并且喊出“到民间去”的口号。

“主义譬如一面旗帜，旗帜立起来，大家才有所指望，才知所趋赴。”经过五四运动，马克思主义唤醒了一批正在寻求救国出路的先进知识分子。他们不仅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，而且找到了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的精

神武器，拥有了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。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。周恩来作为当时著名的青年领袖，是最早也是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，其重要作用可想而知。

周恩来在爱国斗争中逐渐认识到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不能单靠学生请愿上书、罢课示威，更重要的是发动工农劳苦大众。民众觉醒了，斗争才能有出路。从日本来骚动尤其是中国的五四风暴中，他深知工农劳苦大众是革命的伟大力量，“要根本改造社会，就需要唤醒学生和民众的觉悟，不能等着腐败政府来杀戮，我们要把有这样志愿的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。”坚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之路，也是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。周恩来就是这条道路坚定的开拓者之一。

周恩来和他的年轻战友们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农群众的过程中，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，不断砥砺自己，不断成长成熟。这些青年先锋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。

